

有那么多文学批评工作者在严厉批评当前文学批评的弊端——诸如文学批评不是忠实于文本的细读和基本的学理,不是忠实于艺术的审美律则,而是依赖于公众舆论和个人私情等等。我觉得既然这种批评的批评主要来自批评的内部,这样的弊端就应该不可能成为阻碍当前文学批评有效性的主要病状。所以,我更愿意认同王先需的观点,即“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文学批评有很不相同的处境、地位;决定文学批评发生社会效应的大或小、快或慢、显或隐的,不仅在它自身,还会受制于、甚至是更要受制于客观条件。”(王先需:《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漫议》,《文艺报》2012.3.16。)

那么,制约我们今天文学批评发挥有效性的“客观条件”是什么呢?我想,其中比较重要的因素,可能与“读者”难逃干系。

通常以为文学批评主要是与作家交流怎样写和与读者交流怎样读。王富仁有个观点:文学批评在其最根本的意义上,不是为了与作家的交流而存在,而是为了与读者们的交流而存在;如果是为了与作家交流,写封信就够了,没必要发表文章;而且,如果是为了与作家交流,作家已死,有关他的作品的批评就不可能继续进行了(王富仁:《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略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1.3)。王富仁所说显然有道理,否则,在交通电讯网络如此发达便捷的今天,与作家的直接交流越来越容易了,文学批评文章的产量为什么不是日益减少而是越来越多呢?

如果确认了文学批评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为了与读者交流。那么,谈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可能首先要考虑的就不能不是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在多大程度、多广范围上实现了与读者的有效交流。这就需要谈一谈今天的“读者”状况。

在今天,“读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正在消失的概念。这一讯息来自最直接面对“读者”的图书馆事业。据悉,最早是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已很少把利用图书馆的人称为“读者”而都改称“用户”了。如今在我国,无论是公共图书馆还是高校图书馆,也已经于不经意间在其专业术语中将图书馆的服务对象由“读者”替换成了“用户”。“读者”和“用户”有什么区别呢?相比于“用”的功利性,“读”显然没有那么明确的功利目的。在我们传统的“读书”行为中,“读”常常是一个心智对另一个心智的探访,是一种以心会心,是孟子所谓“以意逆志”。在我们留存于记忆的“读书”经验中,就像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人不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一样,面

# 读者与用户之兴替

□黄忠顺

对同一本书,反复的阅读甚至就像是与作者就同一个主题反复对话,每一次都有心得产生。曾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博尔赫斯把“读书”视为同作者灵魂的交流,所以他很认同爱默生的读书观,他说爱默生“在一次讲座中,他称图书馆是一座神奇的陈列大厅,在大厅里人类的精灵都像着了魔一样沉睡著,等待我们用咒语把它从沉睡中解脱出来。我们必须打开书,那时它们便会醒来。”由此,我们可以说,在“读”以及“读者”观念中,很大程度上是将阅读视为主体间的交往,不仅“读者”是主体,被读对象也是主体。而“用户”就完全不同了,“用户”强调的是为我所用,强调的是消费。它是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与广泛使用以及商业化的产物。当藏书数百万种的图书馆已经电子化和网络化为“读秀知识搜索”之类的数据库,当中国几乎所有可看到的中文报刊已经电子化和网络化为“中国知网”或者“维普资讯”之类的数据库,传统的书籍报刊内容,无论是张炜的鸿篇巨制《你在高原》也好,还是王鸿生的批评论文《小说之死》也好,统统作为“资讯”、“信息”被动态地组织到为满足“用户”需求的知识管理系统中来了。在这样的知识管理系统中,一部小说或者一篇批评文本被分成众多的知识元(即知识的最小单位,类似于语言的最小单位“语素”),然后根据“用户”各种各样的个性化需求通过一定的语义逻辑一再地重新组织连接起来,形成“用户”所需要的“知识增值”,甚至是催生“新知识”。作为“用户”的我们在其中键入各种各样的检索词,随心所欲地检索、挖掘自己需要的“信息”和“知识”。而那曾经被视为另一个主体,被爱默生称之为像着了魔一样沉睡的精灵,所遇到的已经不是把它唤醒的咒语而是把它化为碎片再重组的检索词。在更现代化的国家,已经开始出现没有书的图书馆,取而代之的是联机检索终端和一间间带投影仪的小型聚会室。当然,在我们的图书馆里仍然摆放着书籍,摆放着报刊,但“用户”的心态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改变了我们对待这些纸质书籍和报刊的方式。即使你不用“读秀知识搜索”,不用“中国知网”,你

只要用互联网,你一样会获得这样的“用户”心态。有了这种“用户”心态,你面对书刊,就渐渐地只习惯于在其中浏览捕获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和“知识”。书刊已经不再是用来“读”的,而是用来“查”的,或是用来“消费”的。就像有了电视之后,看影视的人再去阅读,其阅读方式、阅读心理就会被改造。海岩说过一个统计数据,人们看电视选台,通常是每8秒钟一次台。也就是说,在8秒钟的时间内你的节目内容还不能吸引他的眼球,他就会往下一个台走。50多个台,经常是在那里调来调去。电视就这样把人们训练得越来越没有耐心读书了。不仅我们一般读者,就连那么推崇卡夫卡并深受其影响的余华也表达过他曾经的耐心已经离去,他读不进卡夫卡了。

说“读者”是一个正在消失的概念,肯定会招来反驳:如今的文学创作量不仅空前之大,而且纸本作品也卖得很好啊!比如,就连被人称为“全中国看过这部400多万字书的只有一个人:贵编”的《你在高原》,在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前的一年间已经销售两万余套,这又怎么解释呢?其实,被称之为“严肃文学”的名家之作,一段时间以来常常都有比较稳定的数万册的可观销量,但这好销的秘密似乎与“读者”关系不大。高校扩招后本科教学评估指标规定年生均图书增长量不能低于5册(纸本)。我国高校有两千多万在校学生,也就是说,仅全国各高校图书馆每年就要购进上亿册的新书,再加上我国现阶段蓬勃勃的城市文化建设使许多城市的公共图书馆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资金充足,其购书量也是空前的。此外还有“农家书屋”等各种文化工程。现在,图书销售商家们的主战场已经不在书店而在“馆配”等图书配送业务。这里顺便说一下,3年前,我在我们学校图书馆发现众多外国文学重译本。比如,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我国1943年出版第一个汉译本。从1959年到1980年代末没有新的译本问世,进入新世纪以来却译本大增,截止2007年该书已经出了65种版本。新的译者多达26位、染指该书的出版社多达43家。而新世纪以来出版《堂吉珂德》汉译本的出版社多

达56家。这样的出版是不是很疯狂?还不是照样销售了出去。因为图书馆书采用ISBN号查重,这些译本都有各自的ISBN号,结果各图书馆每见一个ISBN号都几个复本的数量购进充斥于书架。我连续调查了我校文学院中文专业三个年级500余名学生,没一个学生举手读过《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或《堂吉珂德》。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又调阅了我校图书馆管理系统中的借阅记录,即使《你在高原》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迄今仍然没有被借阅的记录。看来,一段时间以来文学图书销量的增长依赖的是购买力的增强而不是人们的阅读。

以心会心、以意逆志的“文学读者”的急遽消失,或者用美国知名作家菲利普·罗斯的说法:“一代严肃读者消失了”,这使作为在其最根本的意义上是为了与读者交流怎样读的文学批评,空倒地失去了其应有的需求。与这种需求的消失相比,我觉得文学批评所谓资本势力入侵问题、权力干预问题、圈子化问题,廉价吹捧问题、文风晦涩问题、不忠实于文本细读和艺术律则问题,都还谈不上是障碍其发挥有效性的主要问题。其实,我们所说的来自于文学批评主体的种种“乱象”,并非始自今日。19世纪巴尔扎克就曾在《幻灭》中通过吕西安这一形象活灵活现地刻画过这样的“乱象”。19世纪,那是被蒂博特称之为“真正的和完整的”文学批评所诞生的世纪。也就是说,批评的“乱象”是与“真正的和完整的”文学批评一同诞生的。不同的是时代的“客观条件”,正如王先需在其文章所引述别林斯基的话,那个时代“批评早已成为我们公众迫切的需要了,任何一份杂志,任何一张报纸,如果不辟出批评和书报评述的专栏,就不能够继续存在”。而我们今天,则是高等教育在新世纪突飞猛进的发展,促成了文学批评从业者众且学历层次高,而这又促成了批评文章产量多多。是这众多的文学批评文章在迫切需要发表它们的杂志而不是别林斯基所说的“公众”在需要这些杂志上发表的文学批评文章。至于文学批评文章的不尽如人意,与其说主要是源自文学批评从业者的职业态度,还不如说是文学批评产量的极度丰富而必然导致平均质量的急速降低。也许,我们无需为这些文学批评平均质量的降低忧心,它们已经置身海量知识管理系统中,拥有被“用户”检索词挖掘、重组、“增值”,甚至变为“新知识”配件的机会。

## 如何增强文艺批评的有效性(9)

# 我们时代应有名家大师

□梁胜明

掌握世界”(马克思语)的方家、专家。

社会主义文化的名家大师,应有思想家和理论家的头脑和思维。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和艺术观,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具有见微知著的透视力和深刻透彻的剖析力,能够透过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抓住生活和事物的本质,善于发现和分析社会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闻问题,帮助群众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而不是思维贫乏、情绪偏激,犯片面性和绝对化的毛病,易受“左”或右的错误思潮的影响,缺乏分辨真假是非和善恶美丑的能力,甚至歪曲历史,丑化现实。

社会主义文化的名家大师,应有社会实践家和活动家的才干和本领。上能“通天机”,下能“接地气”,善于同各阶层接近、同各种人交友,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思想感情上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才能深切感受和正确反映时代的脉搏和人民的心声。而不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只热衷于“自我表现”,倾诉个人悲欢,甚至自视清高,孤芳自赏。

社会主义文化的名家大师,应有专家和杂家的学识和智慧。他们除了精通文学艺术之外,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通古博今,学贯中西。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文史哲经和理工农医等各部门学科、各种知识都要涉猎一下,懂得一点。特别是在当今世界高新技术蓬勃发展,信息浪潮汹涌激荡的情况下,还得学点高新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而不能孤陋寡闻,见识短浅,那样怎能全面认识和深刻反映历史和现实?

社会主义文化的名家大师,还应应有作家艺术家特有的才情和技艺。他们应当热爱生活,满怀激情,富有敏锐的艺术观察力和感受力,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联想力,高超的艺术概括力和表现力,善于综合运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以及各种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塑造新颖独特、生动感人的艺术意象、意境和典型,创造前人未曾创造过的东西。而不能违背艺术规律,失却创新能力,甚至跟风模仿,畸形复制。

要具备上述思想与艺术各方面的综合素质和全面修养,除了健康的体质之外,就要始终保持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昂扬向上、自强不息的心理素质与精神状态,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坚持不懈的毅力,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与艺术实践中,潜心积累生活素材,获取创作源泉,刻苦探索艺术规律、磨炼创作技巧,不断提高审美地艺术地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能力,增强文艺作品的思想启迪力和艺术感染力。而不能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甚至趋时媚俗、投机取巧,迎合低级趣味,追求感官刺激。

千里之行始足下,万丈高楼平地起。人才培养须从早从小抓起。学校是基地,教育是基础。但是,我国的应试教育至今未能根本改观,严重制约了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完整的知识传授体系和技能培训体系,被割裂成支离破碎的“考点”,老师和学生都在围着考试转,会猜题押宝的老师就是“名师”,能考出高分的学生就是“高足”,升学率高的学校就是“名校”。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高分低能,缺乏创造能力。因为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研究生院,学生经常处于涉“题海”,爬“考山”之中,备中考、迎高考、冲刺考研,忙得不可开交,老师们也都在为评副高、升正高、搞辅导而写论文、搞专著、申报奖项,经常疲于奔命。这样怎能保证文学艺术所需要的“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理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列宁语)?怎能成为名家大师和精品力作的出现而打下良好基础?特别是大学的文学教育,在教育目的与培养目标、教育理念与教学内容、教材编写与教学方法、考试制度与考评办法等方面,都不大适应培养高层次、高素质文艺艺术人才的需要。现行大学中文系或文学院都没有培养文艺创作人才的自觉意识,基本上是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脱节,大部分教师只搞理论不搞创作,当然也就培养不出脱懂理论又会创作的学生,因而造成文学理论与创作人才比例失调,而且知识与技能结构组合不全。我们要大力改革基础教育,特别是大学文学教育,培养和造就集专家学者和作家艺术家于一身的教师和学生,以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需要,为促进名家大师和精品力作的出现打好基础。

# 总结党领导文艺的历史经验

□王 岩 张 永

常勤毅的新著《现当代文学中的党史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版,该书系2011年度宁波市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11CB-B01),在当下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不拘一格,颇为引人注目。

首先,是视角的新颖性。作者在对中国现代文学了然于胸的同时,确立了全书一个清晰完整的论述视角——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新文学,试图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进行宏观的理论把握。从这个角度把握文学史,其实具有相当的难度。

第一,以往的文学史(如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在相当程度上带上了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色彩。如何在处理相同的文学史实的过程中避免文学史叙述的雷同化,追求文学史叙述的客观性、科学性 with 陌生化,无疑给作者带来了很大的学术风险和挑战。第二,部分学者对政治理解的偏颇,甚至笼统地放大了在中国新文学发展过程中,政治对文学的过分干预和干扰,导致新文学创作的弱化。也有可能认为政治意识形态会制约文学史的深入研究。显然,这些观念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客观联系。情绪化的观点不能代表理性冷静学术研究。作者倾向认为,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必须与政治存在这样那样的联系。文学本身本身就是意识形态,所以文学完全可以表现也必然表现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学将如何审美地、艺术地表现主流意识形态。正是在这样一个并不被看好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研究的语境中,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又给作者提供了难得的研究机遇。

## 科幻小说上了《人民文学》

刚刚出版的2012年第三期《人民文学》杂志以专题形式刊登了科幻作家刘慈欣的四篇小说。这是刘慈欣的科幻小说第一次在主流文学刊物上刊登,也是时隔30年,主流文学界再次把目光对准科幻作家。与那些主流作家相比,一个科幻小说作家想上《人民文学》这样的严肃文学杂志并非易事。科幻小说尽管也是小说,可更有可能是旁门左派,不如社会、历史小说出身名门正派。1978年《人民文学》刊登的《珊瑚岛上的死光》风靡一时,促成了科幻文学的一次小繁荣。但30年后的这次关注竟能产生多大的影响?这还真的不好说。在笔者看来,科幻文学与《人民文学》也只是人次邂逅而已。过去一本《人民文学》可以说人人争相传阅,一个作家上了《人民文学》也能一鸣惊人。可是过了这么多年,现在的《人民文学》尽管发行量在纯文学类期刊中数一数二,但毕竟只是小众的刊物,只属于那些纯文学爱好者。在玄幻、魔幻、穿越小说风行的今天,科幻小说也只是陪衬而已。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算得上不错的作品,可销量也只有40多万册。与郭敬明的小说《幻城》相比,也只有一个零头而已。能登上《人民文学》杂志,这是一种荣誉,更是对刘慈欣作品的肯定。期望一本文学杂志的关注能迎来科幻文学的春天,这个想法是不是有些太过天真?传统文学萎靡不振,《人民文学》逆境中艰难生存,这样的状况之下,关注科幻小说也只能是关注而已。

关东客(辽宁)

## 提高稿酬维护写作尊严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3月12日做客中央台直播间,表示稿酬标准将调

整。柳斌杰表示,原来定的稿费的标准过去快20年了,这个标准很低。而事实上现在稿酬标准出版社已经灵活掌握了。因为知识分子劳动创作的是知识产权,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有的可能几年,或者十几年。因此,国家版权局准备调整这个标准。1990年颁布的《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的基本稿酬标准是:原创作品每千字30元~100元,翻译作品每千字20元~80元,改编、汇编作品千字标准更低。这一规定实行10年来,除少数经济效益好的报刊、出版单位突破上述标准外,多数新闻出版单位支付的稿酬标准也就是每千字几十元,达到百元的很少。也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千字文的稿酬不会超过100元。在撰写千字文的时间成本,大概需要两三个小时。平均一个小时的经济价值是25元左右。这还是不敷一点的,如果是30元的稿费标准,简直就是入不敷出、“文字苦力”。再看看时下高级技工的收入行情,一个小时的价值不少于200元。脑力劳动者的收入竟然比不上体力劳动者,写作成了一种“脑体倒挂”,呈现明显的分配失衡和价值倾斜,文化尊严、体面写作,从何说起呢?时下,写作圈内的一稿多投现象很严重,除了诚信流失,另外的重要原因就是稿费太低,创作者觉得“吃亏太大”。所以,就扔掉了一稿一投等诚信原则,通过多投谋求写作利润最大化,多投成了潜规则,扰乱了写作应该具有的淡定、从容和秩序,污染了文化人的社会形象。还有有的作者为了提高收入,维持生计,只得通过提高创作量,增加收入,造成创作质量和与原能力的下滑,柳斌杰前不久表示,目前国内很多文化文艺作品创作力不够,90%的作品属于模仿和复制的。严重影响了文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再看看物价行情,十几年间,物价翻了几番。而稿费标准却仍然停留在1990年,二十几年前挣钱,放在今天花,呈现严重的价值贬值,简

直就是一种“羞辱性条款”。

稿酬标准太低,不仅抑制了写作者的收入,更让整个社会形成了轻视写作者权益、不尊重写作劳动的“文化恶习”,比如很多门户网站转载各种作品,却从不支付给作者报酬。用撰稿人的辛苦劳动支撑起自己的财富大山,这也是一种“带血的GDP”。随着文化市场的发展,群众对原创作品的呼声越来越高,作家和撰稿人明显满足不了这种发展态势,形成一种供需落差,作家不愿意写,群众很失望。对于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一个无形抑制。诸如当下的文化现象,中国电影走不出国门,当代文坛难出扛鼎之作,与这种劳动报酬的“民工业化”不无关系。一个崇尚创造、喜爱文化的大国,就应该将文化知识产业和文化尊重放在重要地位。所以,国家终于要提高稿酬了,让作家和撰稿人摆脱“文化打工者”的卑微地位,得到体面的经济收入,使他们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投入再生产、再创作,保持淡定、从容、沉稳的写作心态,写出更多深刻作品;经济收入的提高,也将会提高作家和撰稿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更多尊重与合法权益,让“诚信写作”、“快乐写作”成为可能。据报道,美国“每千字的稿费在750到2000美元之间。像《纽约时报》这样级别的报纸,相当于中国的《北京日报》或《新民晚报》,一篇千字文章的稿费是2000多美元,折合成人民币,每千字的稿费为4800元到12800元。”从这个意义上说,提高稿酬也是和国际接轨,但愿国家版权局能为之列出时间表,让提高稿酬早日得到落实。

耿银平(河南)

来稿请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wybdzhu@163.com

## 读者评论

## 洞察